

中日考古学的历程

◎ 蔡凤书 著

齐鲁书社

中日考古学的历程

◎ 蔡凤书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考古学的历程/蔡凤书著. —济南: 齐鲁书社, 2005. 1

ISBN 7-5333-1444-1

I. 中... II. 蔡... III. 考古学史—研究—中日 IV. K 8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9347 号

中日考古学的历程

蔡凤书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 - 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32 开

印 张 9.125

字 数 221 千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444-1/K·444

定价: 21.00 元

前 言

中国和日本都位于亚洲东部地区,其间仅仅有一海之隔,历来被人们称颂为“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

自古以来,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在文化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文化面貌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种现象越是在古代也就越发明显,以至于有个别人断言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同俗”。其实,这个提法只看到了一些表面现象,模糊了二者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所以并不正确。

说到同种,近代人类学研究的成果表明,中国人(这儿是指以汉族为主体、广义上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大和民族)虽然同属于蒙古利亚大人种,但是如果细分起来,在二者之间又可以举出不少差别点来,并非绝对同种。

从语言的角度观察,中国语(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而大部分学者认为日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汉语和日语在语法上有根本的区别:前者依靠语言的顺序来表达主语、谓语、补语和宾语等关系,而后者依靠各种助词来完成。

中国和日本固然都使用汉字,而且日本的汉字是从中国移植过去的。可是,汉字在日本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无论在字形上还是在表达的意思上都和中国的汉字有了很大的区别。如果我们把1968年在埼玉县稻荷山古坟发现的错金铭文铁剑作为日本最早使用汉字的标志的话(5世纪),那么汉字正式被引入日本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日本人又根据需要创造了不少“日本汉字”,如“峠”、“姉”、“辻”等。

尽管古代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风俗习惯上有一些相同的地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风俗习惯的差别在加大。例如日本在7月7日(阳历)也有“七夕”之说,但是没有牛郎与织女的故事。虽然日本人把阳历的5月5日叫做“端午”,但是没有纪念屈原的意思,而变成“儿童节”了。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和日本在许多方面不可能简单地等同。有个日本学者就曾经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和日本不是同种同俗”^①。

长时期在文化发展的道路上,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社会制度的影响,再加上民族的心理状态、文化背景以及价值取向的差异,中日之间文化上共同点的范围在逐渐缩小,而分歧点的范围却在日益扩大,如果无视这些客观存在的事实,在比较文化的研究上就只能停留在表面,不可能导向深入。“实际上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记述现象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力图从理论上把握事实,这才是比较研究应当采取的方法。”^②

2 | 中国和日本之间在文化上的歧异在最近一百五十年来日益明显。1868年日本发生了举国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以“明治维新”为界,日本人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态度发生了180°的大逆转。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人对中国的政治典章制度、经济政策、科举取士、尊孔读经等都是推崇备至,处处以中国为榜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向往的是欧美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各种科学文化,言必称欧美,处处以西洋诸国为范。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明治维新以前提倡“和魂汉才”,即具有大和民族的精神同时有深厚的汉学功底,明治维新以后转向培养“和魂洋才”式的人物。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也像中国的“闭关自守”一样采取了“锁国”的政策,明治维新以后,变“锁国”为

“开国”。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待新兴的科学文化事业所采取的态度与当时的中国截然不同,其差别不啻霄壤。

倘若进行文化比较研究,首先应当确定“文化”的概念。当今世界关于“文化”的定义和概念是多歧的。翻开各种大百科全书或者是其它辞书来看,关于“文化”的解释不下几十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日本学者井门富二夫对文化的解释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文化是以地域全体、阶层、民族、宗教、产业等各种各样的形态来表现的体系和生活方式。”^③由此看来,“文化”所涵盖的范围非常之广。

对涵盖面如此之广的文化之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比较文化的研究在当今世界各地正在蓬勃兴起。在中日比较文化的研究中,探讨近现代中日文化的异同固然重要,可是追寻自古以来中国大陆和日本列岛间文化上的相互渗透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同和不同的内在原因,同样值得重视。过去我们在分析这些异同点的时候往往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去找原因,而忽略了民族的心理因素,这是不全面的。

考古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考古学在中国和日本经历的过程有许多方面是共同的,当然也有不同的一面。这些异同的产生源于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精神文化蕴积的厚薄以及作为文化主体一人的心理状态的制约。

比较中国和日本在考古学发展历史上所走过的道路,认真探索二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寻找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是比较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过认真的考虑,在中日考古学发展史的比较上可以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笔者不揣浅薄,在毫无前人同类著作借鉴的条件下,只能根据个人多年来积累的资料和长期的思考,试图对这一问题做些综合比较。但是毕竟囿于私人见闻,在

这本书中必然有厚此薄彼、挂一漏万的地方。尚希各位方家不吝指正。

【注释】

①陈舜臣：《日本人と中国人——“同文同種”を思いこむ危険》，祥传社 1971 年。

②尾藤正英：《日本と中国との比较研究ための序説》，中国文化丛书 10，《日本文化与中国》，大修馆书店 1968 年。

③井门富二夫：《比较文化研究序说》，玉川大学出版部 1991 年。

序

值此蔡凤书先生《中日考古学的历程》一书由齐鲁书社出版发行之际,请允许我写以下几点。

这本书是作者基于丰富知识的力作,在论述如何看待古代中国和日本考古资料的基础上,阐明中国和日本的近代考古学是怎样产生的。

论述中国和日本从古代至现代人们如何看待考古学,并且试图作比较,这是迄今为止所没有的,所以这一课题的研究有很大的难度。只有对中国和日本的考古学资料和历史文献十分熟悉的人才能做到。

蔡凤书先生长年执教于山东大学,他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中心,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成绩卓然。1982到1984年他作为中国第一批公费留学生在京都大学文学部留学两年,2001年又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进行了一年的研究工作。这期间使他有可能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对多个学科领域进行了深入探讨。

蔡凤书先生首先是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和日本的绳文时代进行比较研究。这是当时日本的考古学家还没有来得及考虑的新视点,现在从日本绳文时代遗迹中发现的有关中日交流的资料与日俱增,证明蔡凤书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其后,蔡凤书先生对日本的弥生时代、古坟时代、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以至于镰仓时代(即中国的宋元时代)做了多方面的研究,阐明各个时期中日交流的实态和性质,并使之形成了体系。

本书是蔡凤书先生长期而广泛研究的总结,他或许是本课题执笔写作并正式发表的第一人。阅读本书之后,一方面使我们产生了对古代考古学资料 and 历史的关心,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了解到以与欧美交流为契机的中国和日本近代考古学产生的过程,同时也看到中国和日本存在的差异。

蔡凤书先生在推进中日交流研究的同时,他和日本友人、同事以及学生的交往也加深了,我有幸和蔡凤书先生在京都大学和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共事,有长达 20 多年的深厚友谊。这期间我从蔡凤书先生那里学到了认真治学的态度,而且通过在一起调查多方得到教益。能够为蔡凤书先生这本书写序言实在荣幸之至。

本书的出版发行对于如何理解中国和日本考古学的过去,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在展望未来中日间的学术交流上也有一定的启发。在我衷心祝愿本书出版发行的同时,我希望大家也能抽时间阅读这本书。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宇野隆夫
2004 年 11 月于京都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章 萌芽期的差距	(1)
第二章 探索期的异同	(17)
第三章 近代考古学的产生	(37)
第四章 战争与考古学	(61)
第五章 战后的恢复期	(89)
第六章 直线上升与波动前进	(121)
第七章 继续发展与动荡不安	(153)
第八章 差距逐步缩小的十年	(189)
第九章 与世界考古学同步	(232)
后记	(282)

第一章

萌芽期的差距

考古学是通过对古代遗迹和遗物的调查发掘,并对由此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析判断来研究历史的学问^①。本文所谓的考古学“萌芽期”是指古代人们对于古物和古迹的观察、记述以及朦胧的认识,根本还不存在“分析”或“判断”的问题。所以考古学的“萌芽期”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学。

这个“萌芽期”,在日本由于文字产生的时代比较晚,没有文献可征,只是到有了文字之后,我们在文献中才可以看到零星的记载,所以日本考古学的“萌芽期”是指公元 8 到 13 世纪;在中国,情况就和日本大不相同了。由于中国文字产生的时代早到距今三千年以前,从公元前 6 世纪起就有像《诗》、《书》、《易》、《礼》、《春秋》这样的历史记载,汉代以后有了更多的文献记录,所以笔者把中国考古学的萌芽期定为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

追寻自己祖先的历史,几乎是所有文化发达到一定高度(至少是脱离了四处游荡或穴居野处阶段)的民族或者是部族普遍的愿望。古代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也不例外。在文字产生以前可能还有一个口耳相传的时期,这一时期神话传说的成分比较多,以讹传讹和变了形的传说也不少,所以不足为信。

现在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尽管已经充分享受到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科学昌盛的社会里,竟然有很多人保持对上天、神样(かみさま)和佛的信

仰。反观古代日本人,即使生活在物质和精神文明都很低劣的条件下,也并非完全依赖神祇,他们甚至不仅不完全相信神话传说,而且还力图摆脱神话传说的束缚来阐释历史。7、8 世纪的日本人往往很看重偶然发现的地下出土物,并且试图把这些出土的文物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至于联系的正确与否自然另当别论,但是这种探索的意图却是值得称道的。

成书于公元 8 世纪的《常陆国风土记》“那贺条”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平津驿家西十二里有冈,名曰大栴。上古有人,体极长大,身居丘垄之上,采蜃食之,其所食贝,积聚成冈,时人取大朽之义,今谓大栴之冈。其大人践迹,长卅余步,广廿余步。尿穴址可廿余步许。”^②8 世纪的日本人就推测,常陆国的这些贝

諸水最前之木
四字號也
按圖錄之
然此處所
之文也故
猶存以備考
子大寺二村
相連今建天
郡古郡則地
邑務云今大
拓開東前村
沈今此開床
和名彩那那
茨城縣不知
所在時卧山
並同視見下
校圖達本紀
刀便後都田
達子勢賀之
祖也今此開
其地也

最前之平津驛家西十二里有岡名曰大栴
上古有人體極長大身居丘壟之上採蜃
食之其所食貝積聚成岡時人取大朽之
義今謂大栴之岡其大人踐跡長卅餘步
廣廿餘步尿穴趾可廿餘步許以下縣之
茨城里自此以北高丘名曰嘯時卧之山
古老曰有兄妹二人兄名勢賀毗古妹名
勢賀毗咩時妹在室有人不知姓名常就

常陆国风土记

壳堆是古代人吃剩下来的东西,这当然是正确的,可是把古代人的身材描写得高大出奇,竟然一伸手便可以探海取贝,而且仅尿穴的径迹就有 20 步之多,如果每步折合日本 8 世纪时的 6 尺,每尺为 30 厘米计算,20 步就是 36 米左右! 则未免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根据近代考古学调查和研究证实,在古代的常陆国

(即今天的茨城县一带)确实有许多贝丘(贝冢)遗址,有的已经经过正式的科学发掘。其中,茨城县的水户市大串贝冢(在日本语中“大串”的发音和前面提到的“大栲”完全一样,这并非偶然巧合——笔者注),经发掘研究证实是一处绳文文化前期的遗址,距今已有 5000 多年的历史^③。类似《常陆国风土记》所记载的传说还有一些,这儿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江户年间(1644—1868 年)学者久佐间洞岩撰写的《奥羽观迹闻老志》一书中亦可看到。该书中讲到磐城国(在今天的福島县境内——笔者注)新地村有个手长明神,这个神住的地方叫“贝冢居”,据说这个神可以伸出长手从东海取回贝类为食物,吃剩下的贝壳堆积成了丘冈,当地的居民对于这个手长明神倍加崇祀。现代考古学调查的结果表明,该书中记述的贝冢就是福島县相马郡新地村大字小川的绳文文化遗址^④。

我们由以上两则记述看,尽管古代的日本人对于贝冢的制造者给以过分的夸张,但是他们明确认识到贝冢是太古时代人类的遗物,这是难能可贵的。

从日本的历史文献的记载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当公元 7 世纪的时候日本人就已经发现了当今被考古学家确定为弥生文化时代(一般认为弥生文化的时代为公元前 3 世纪到公元 2 世纪末,根据最新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报道,我们知道,日本有的学者把弥生文化开始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 5 世纪——笔者注)典型器物之一的铜铎。根据《扶桑略记》的记载,天智天皇七年(公元 688 年)在近江国的滋贺郡(今天的滋贺县),由于兴建崇福寺平整土地,掘出“奇异宝铎一口,高五尺五寸”。崇福寺的所在地就在今天滋贺县大津市的滋贺里。滋贺里不仅有绳文文化遗迹,也有历史时代的遗迹,上个世纪 30 年代发掘滋贺里遗址的时候,曾经发现过许多佛教遗迹,从而证实《扶桑略记》中有关出



铜铎的发现(石山寺缘起绘)

土铜铎的记载是可靠的。又据《续日本纪》的记载：“大倭国宇太郎郡波阪乡人、大位初上村君东人得铜铎于长冈野地，并献上。高三尺，口径一尺，其制异常，音协律吕……。”承和九年(公元842年)在若狭国(今天的福井县)、贞观二年(公元860年)在三和国(今天的爱知县)分别有铜铎出土^⑤。又根据时代稍晚一些的文献来看，我们得知公元668年在近江国(今天的滋贺县)、821年在播磨国(今天的兵库县)也有铜铎出土^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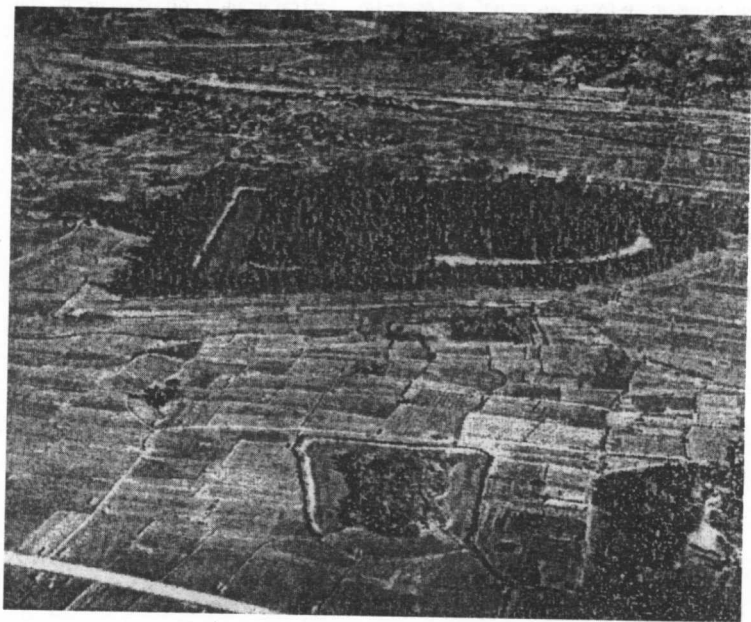
但是从公元860年之后，在长达八百年的时间内看不到有关铜铎出土的文献记载，究竟是没有发现，还是发现了没有记载，不得而知。一直到了江户年间，这些古物又再一次地引起人们密切的关注。江户年间的学者还把出土铜铎的形状如实地描绘下来，并且记录了铜铎出土的经过。这些记述即使是在今天，对于考古学家们来说仍不失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根据《续日本后纪》卷八承和六年(公元 839 年)的记载,八月二十九日出羽国(今天的山形县和秋田县一带)田川郡西滨海岸长时间下雨,伴以雷鸣,十天之后才放晴,人们在海边发现有类似箭头或枪头的石器,彩色多样。询问当地有阅历的老者,他们也说这是第一次见到。当地的国司将这些石器搜集起来,献给朝廷。朝廷以为这是天灾异变的不祥之兆。出羽国发现石器的地点就是今天山形县饱海郡游佐吹浦町,那一带至今还有许多绳文时代的遗址,在饱海郡游佐町大字女鹿村还发现过和中国商代末期一样的青铜刀^⑦。公元 855 年或 856 年在出羽国又陆续有类似的发现^⑧。其实一直到江户年间,在海边发现古代石器的事时有发生。对于这些现象,不仅朝廷和官府感到恐慌不安,而且一般的民众也以为不可思议,认为这是天工之物。古代信州(今天的长野县)一带的人把古人作石器时留下的黑曜石碎片叫做“粪石”,认为它们来自上天。

把石器时代的遗物和雷雨联系在一起,这几乎是世界各民族共同的观念。例如丹麦和瑞典古代的人们认为石斧是雷雨天随着闪电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古代也有“霹雳斧”和“雷公斧”的名词,非洲的部分地区居民认为石器是上苍为了惩罚坏人而投下来的。

在《日本书纪》雄略天皇九年条中有一个故事引起了现代考古学家的兴趣。这故事说,有一个人为了祝贺自己的女儿生孩子前往女儿家,夜半骑马回家经过誉田山古坟(这座古坟是目前所知日本在建造规模上排名第二的古坟,相传是应神天皇陵,地处今天大阪府堺市——笔者注),遇到一个骑红色骏马的男子,他用红色骏马换了这人骑的马。这人便高高兴兴骑上红色骏马回家了。谁知到第二天早上一看,这人惊愕地发现红色骏马已经变成一匹不能骑乘的素烧陶马。这个故事反映了古代日本人

可能已经知道或者是偶然发现过巨大古坟周围出土的“动物形埴轮”^⑨。但是那时的人并不知道埴轮的用途,所以觉得奇怪,并且编造了一些故事出来。



传说古代日本人在此周围见到埴轮的誉田古坟

日本古典文献《释日本纪》中引用的《筑后国风土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位于今天福冈县八女市的筑紫君盘井古坟的事,不仅描绘了坟丘和墓域的情况,而且还介绍了和这古坟有关的石人、石兽和石盾的配置。如此详细的记录,想必是当时人观察到的情形。江户年间有学者认定筑紫君盘井古坟就是岩户山古坟。这个说法虽然没有最后被证实,但是该古坟的现状和古代文献的记载相吻合,这在考古学史上是值得一提的^⑩。

到了7世纪末叶,古代日本人已经意识到那些高出地面的坟丘是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而且认为对这些古坟应该加以

保护。根据《续日本纪》卷四的记载,当时的政府曾经下令如果因为在建设平城宫而毁掉的古坟,需要重新掩埋,不允许暴露在外面,或者是弃诸荒野。以现在的眼光审视,这则命令多少带有保护古迹的色彩。

镰仓时代嘉祯元年(公元1235年)三月,大和地区的“大内陵”遭人盗掘,举国上下大为震惊。此事虽然见于《明月记》和《百练钞》等书的记载,可是最详细记录“大内陵”被盗掘事件的是此事发生600多年后明治年间(1868—1911年)在京都高山寺发现的一部古代文献——《阿不几乃山陵记》。1235年被盗掘的“大内陵”在江户年间叫做“青木山陵”。从《阿不几乃山陵记》的记载来看,“大内陵”和“青木山陵”是一个地方,这就是今天的奈良县橿原市高市郡明日香村的王墓古坟。如果把《阿不几乃山陵记》中记述的古坟形状、墓内的随葬品、石棺的结构、人骨的保存状况以及可能是藏骨器的镀金容器和《日本书纪》或者是《续日本纪》等文献对照起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个“大内陵”就是天武天皇和持统天皇的合葬墓^①。

13世纪以前日本的文献关于古迹和古物的记载不仅数量少,而且十分零散。大体上如上所述。

从两千多年前开始,古代中国的先哲们就十分关心出自于地下的古物。根据《孔子家语》^②的记载,有一次季桓子在掘井的时候从地下发现了一些动物的骨骸,他把这些骨骸拿到当时被公认为大学问家的孔夫子那儿,请他鉴定。孔夫子说这是“坟羊”,也就是古代人埋葬的羊。究竟是不是羊?现在则很难断定。可是,如果以当今科学知识重新审视,孔夫子所说的“坟羊”极可能是古代遗留下来的脊椎动物化石。“坟羊”的出土地点在今天山东省南部属于临沂地区的费县。那一带是石灰岩地层发育良好的丘陵地,至今仍然有大量古代动物化石出土。